

ZHONGGUO XIANDAIHUA SIXIANGSHI



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立项项目

# 中国现代化思想史

(1840-1949)

程美东 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立项项目

# 中国现代化思想史

(1840—1949)

程美东 主编



高等 教育 出 版 社  
HIGHER EDUCATION PRESS



## 内容提要

本书是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立项项目成果，其作者是一群一直致力于近现代中国社会思想史领域研究的学者。本书以现代化为视角，系统、全面地梳理了1840—1949年这一百多年间中国先进的社会思潮的发展线索，详细地分析了这些社会思潮发展的历史成因和社会价值。本书不仅从政治思潮、富国之道、强兵理想、教育观念、精神家园、思维视野等六个方面详细地介绍了中国现代化思想史的基本内容、发展脉络，而且还对现代化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认真的研究，提出了自己对于现代化的独特理解。综观全书，资料翔实，观点鲜明，见解深刻，是一部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教材。

本书可以作为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的通识课教材，也可作为政治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等专业的专业课教材。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化思想史：(1840—1949) / 程美东主编.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5

ISBN 7-04-017141-4

I . 中... II . 程... III . 现代化 - 思想史 - 中国 -  
1840—1949 IV . B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28967 号

策划编辑 马俊华 责任编辑 李征 封面设计 刘晓翔

版式设计 张岚 责任校对 王超 责任印制 宋克学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总机 010-58581000

经 销 蓝色畅想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1/16  
印 张 18.25  
字 数 340 000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免费咨询 800-810-0598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网上订购 <http://www.landraco.com>  
<http://www.landraco.com.cn>  
畅想教育 <http://www.widedu.com>

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3.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料号 17141-00



## 本书编者

(按所写章序排名)

---

程美东 时广东 孔祥宇 章永俊

武军 卞修全 张小莉 刘馨

# 目 录

---

<b>导论 中国现代化的坎坷命运</b>	1
一、“现代化”本义考	1
二、中国现代化的缓慢启动	8
三、中国现代化的艰难发展	27
<b>第一章 政治思潮的新陈代谢</b>	46
一、中国政治现代化思潮发展过程中的三大坐标：保皇、 救亡、启蒙	46
二、中体西用思潮	55
三、改良主义思潮	62
四、自由主义思潮	72
五、西学中化理论	78
<b>第二章 富国之道的苦苦探索</b>	86
一、重农思想	86
二、重商思想	94
三、振兴实业论：从《资政新篇》到《实业计划》	105
四、科教救国思潮	116
<b>第三章 强兵理想的不断追求</b>	122
一、“师夷长技”的军事思想	122
二、洋务运动时期的军事思想	129
三、甲午战争后的军事思想	141
四、民国时期和国民党时期的军事思想	149
五、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	157
<b>第四章 教育观念的次第更新</b>	163
一、从经世致用到学习西方	163
二、洋务时期向西方学习的主张	171

三、维新时期的教育改良思想 .....	180
四、民国时期的现代化教育思想 .....	189
五、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教育思想 .....	197
六、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 .....	204
<b>第五章 精神家园的艰辛拓荒 .....</b>	<b>209</b>
一、“精神家园”解读 .....	209
二、近代国人对儒家伦理思想的反思与批判 .....	211
三、西方伦理价值观念的传入与冲击 .....	215
四、困惑中的文化抉择 .....	223
五、国人价值心理的变化 .....	227
六、文学艺术思潮的新气象 .....	237
<b>第六章 思维视野的日益开放 .....</b>	<b>248</b>
一、传统中国人的华夷意识及其危机 .....	248
二、重新认识世界 .....	252
三、近代国家观念的萌生 .....	263
四、逐步走向成熟的外交思想 .....	268
<b>主要参考文献 .....</b>	<b>282</b>
<b>后记 .....</b>	<b>284</b>

# 导 论 中国现代化的坎坷命运

## 一、 “现代化” 本义考<sup>①</sup>

从 20 世纪后中期开始，“现代化”逐渐成为中国社会中最响亮的名词之一，它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被使用的频率之高已经无法用确切的数字来加以描述。但是，人们对其耳熟能详的感受很大程度上仅仅停留在对该词所具有的外在时间特性的认识上，而缺乏或者说长时间里人们根本就没有对其具体的内涵进行深入地思考。大凡治学，不正其名，不明其义，就无法形成正确、系统的理论。可以说，当今世界上无论学界，还是政界以及一般民众大多数都承认“现代化”是正在发生的客观存在。因此，系统地研究“现代化”问题是一件极富意义的事。而搞清“现代化”一词的确切含义又是从事这一研究的基本前提。

美国著名学者沃勒斯坦（一译华勒斯坦）根据对《牛津英语词典》的考证认定，早在 1585 年时，人类就已经使用“现代化”一词了。当然，当时该词被赋予的含义很大程度仅是表征一种历法时间概念，而于今天具有特定历史内容的“现代化”概念在内涵上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对于今天的学术界来说，大家在关于“现代化”问题的认识上虽然有着很多的分歧，但毫无疑问，都不否认“现代化”作为一种历史实践，大致肇始于“文艺复兴”时期，而“现代化”作为一种学派、一种思潮，其产生的时间则是近期的事情，即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

现代化理论兴起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欧美，旋而波及世界各地，尤其激起了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政府和学术界的浓厚兴趣。但是，该理论并没有一个统一、严密的体系，它作为探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发展问题的理论，自身没有一个统一的准确的范畴、价值标准，其体系极其复杂、庞大，以至于我们对之虽耳熟能详，却很难说出个中要领，于是常常把它当作一种时尚来加以叙述，“现代化”遂成为万能的上帝，一切完美事物的集合，甚至成为一片只可以感觉却无法触摸的云彩。“现代化”一词之所以给人们造成如此朦胧的印

---

<sup>①</sup> 该书的基本内容参见程美东：《现代化之路——20 世纪后 20 年中国现代化历程的全面解读》，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 ~ 10 页。

象，是与“现代”一词的固有特性有关的：“‘现代’的性质是暂时的，而不是固定的绝对的。诚然，人们用当前的范式为现代化规定了确切的定义，但这基本上是一种随心所欲的行动”<sup>①</sup>。由于“现代”稍纵即逝，用这样的词语命名的理论便很难设定其内涵与外延，从而易被赋予不确定的时代色彩。马克思在1848年就使用了“现代国家政权”、“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代资产阶级”等提法，毛泽东在1949年也使用了“现代性工业”的提法。上述马克思、毛泽东所使用的“现代”指的是工业革命以来的资产阶级时代，与我们今天使用的“现代”含义自然不同。作为一门学术用语，“现代化”之定义绝不能随“现代”含义之变化而变化，而必须有一个稳定的、超时空的客观定义。在设法了解这个客观的定义之前，还是先了解一下国内外对“现代化”一词的各种解释。

首先是国外，主要是美国及欧洲国家学者对“现代化”的解释。S. N. 艾森斯塔德认为：从“历史上看，现代化是一个朝着欧美型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系统演变的过程，这一过程于17至19世纪就在欧美各国完成了”<sup>②</sup>；吉尔伯特·罗兹曼认为：“我们把现代化视作各社会在科学技术革命的冲击下，业已经历或正在进行的转变过程。业已实现现代化的社会，其经验表明，最好把现代化看作是涉及社会各个层面的一种过程”<sup>③</sup>、“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最剧烈、最深远并且显然是无可避免的一场社会变革”<sup>④</sup>；塞缪尔·P. 亨廷顿认为：“现代化是一个多层面的进程，它涉及人类思想和行为所有领域里的变革”<sup>⑤</sup>。西里尔·E. 布莱克指出：“所谓现代化，作者是指这样一个过程，即在科学和技术革命的影响下，社会已经发生了变化或者正在发生着变化……‘现代化’的定义是：就同时存在的社会形式而言，无生命动力源泉对有生命动力源泉的比例已经增长到了或者超过了不可回转的程度。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如果无生命动力的比较少量的减少无法为有生命动力的增加所‘弥补’或者如果不对社会作不可避免的、广泛的改革就无法弥补，那么这个社会或民族就现代化了”<sup>⑥</sup>、“‘现代化可以定义为：反映着人类控制环境的知识亘古未有的增长，伴随着科学革命的发生……从历史上发展而来的各种体制适应迅速变化的各种功能的过程……只有一种无所不包的定义才更适于描述这个

<sup>①</sup> [美] 弗农·V. 阿斯巴图连：《马克思主义与现代化的意义》，转引自《现代化理论研究》，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82页。

<sup>②</sup> [美] 艾森斯塔德：《社会的进化与发展》，牛津出版社1966年版，第1页。

<sup>③</sup> [美] 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sup>④</sup> [美] 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

<sup>⑤</sup> [美] 塞缪尔·P.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0页。

<sup>⑥</sup> 西里尔·E. 布莱克：《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8、19页。

过程的复杂性及其各方面的相互关联”<sup>①</sup>。以上四种观点都是美国学者提出来的，是当今现代化理论界很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但他们对现代化的定义都是非本质的，都只是对现代化的个别特征的描述。艾森斯塔德和罗兹曼的定义，是典型的“欧化”、“西化”论，按照这个定义，现代化理论工作者们就不用积极探索了，因为非现代化国家只要按照欧美国家的价值标准持续不断地走下去，就能实现现代化了。这样一来，整个世界就是清一色的欧美色彩了。可是，难道欧美的生存方式、价值观念就是唯一合理的吗？而且，既然承认欧美一些国家“业已实现现代化”，那么，现在以及近期未来的一段时间里这些国家又处在什么阶段呢？是不是用笼统的、含糊不清的“后现代化”来界定之？如果“后现代化”理论的确有明确的内涵、实在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可以作为欧美那些发达国家的发展目标，那么为什么还要求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或者更广泛一点——广大的非现代化国家朝着比“后现代化”落后的“现代化”目标迈进？大家何不研究一下如何让非现代化国家直接进入“后现代化”的社会？如果现代化理论只是为广大非现代化国家准备的，那就意味着现代化理论已是一种过时的、落后的东西，其现实意义几乎等于零。所以，艾森斯塔德和罗兹曼的关于现代化定义的描述是非科学的，没有普遍适用的意义。亨廷顿的定义也没有抓住“现代化”的本质，只是从“现代化”的外延角度作了一番粗略的描述，这个定义可以适用于很多其他的名词的描述。比如，“封建化”、“殖民化”、“汉化”，这些词语哪一个不涉及社会的各个层面？哪一个不涉及思想和行为的所有领域？因此，这种定义毫无意义。

布莱克的定义把握了科学技术是“现代化”重要特征这一要害，但也有一些笼统、含糊的地方：第一，在科学技术革命影响下发生的变化是否都属于“现代化”？环境污染的加重、道德伦理的沦丧、贫富分化的加剧……这些变化总不能归纳到“现代化”本质中去吧？第二，无生命动力与有生命动力的类型极其广泛，到底是哪些无生命动力的少量减少无法被哪些有生命动力的增加所弥补才算得上是现代化？是不是全部无生命动力都少量减少后，其造成的损失无法被有生命动力的增加所弥补才算现代化？这两种动力类型增减的范围必须要清楚。第三，美国农业由于靠机械化耕作（即无生命动力），使得只有2%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而生产出来的农产品全国都享用不尽；如果美国现在将某些大农场改成手工耕作（比如播种、收割、碾谷均靠人畜之力），我想只要多增加人力、畜力，就一定能达到机械化耕作时的粮食产量。那么，人们是不是据此而认为美国的农业就比其他的行业要落后呢？布莱克的现代化定义之缺点，由此可一目了然。

<sup>①</sup> 西里尔·E·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页。

以上国外学者的四种定义都是从定性的角度来理解“现代化”，还有人从定量的角度来理解“现代化”。在中国学术界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所谓的“英格尔斯指标体系”就是突出的代表，该体系对社会现代化作了具体的量化规定<sup>①</sup>：（1）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3 000 美元以上；（2）农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在12% ~ 15% 以下；（3）服务业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在45% 以上；（4）非农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在70% 以上；（5）识字人口占总人口的80% 以上；（6）适龄年龄组中大学生的比重在10% ~ 15% 以上；（7）每名医生服务的人数在1 000 人以下；（8）平均预期寿命在70 岁以上；（9）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50% 以上；（10）人口自然增长率低于1%<sup>②</sup>。可是，按照这个标准，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已经实现现代化了，其标准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自然就很值得怀疑了。

在目前的中国，很多人喜欢用量化的标准来界定现代化的含义。2001 年年初，中国很多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在人大和政协会议上纷纷提出了本地区现代化进程时间表，其依据就是一些具体的量化指标。在中国科学院的一个现代化研究课题组在所做的中国现代化研究报告中，非常具体地指出了中国各地的现代化发展水平，并指出整个中国的现代化的实现程度已达到0.723。这种量化方法对于了解中国地域发展水平的高低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将之定义为现代化的本质就大错特错了，对社会的发展将会产生不良的后果。

中国国内关于现代化的理论研究目前虽然处在初步阶段，但是“现代化”作为一个被赋予特殊时代意义的名词、话题在中国的出现则是较早的事情。早在20世纪20年代，胡适就在他的文章中使用过“现代化”的提法，及至30年代，“现代化”经常出现在报刊上。当时人们对“现代化”的理解，大多主要着眼于“西化”、“欧美化”、“工业化”这样的角度。“就个人与物品言，现代化含着进步的意思”，“但就国家社会言，现代化即是工业化”<sup>③</sup>（张素民语）；“所谓现代化，最重要的意义，当然是着重于经济之改造与生产力之提高”<sup>④</sup>（杨幸之语）；“目前资本主义列强无不是现代化的国家”<sup>⑤</sup>（杨幸之语）；“30 年前，主张‘维新’的人，即是当日主张现代化的人”<sup>⑥</sup>（胡适

<sup>①</sup> 谢立中在2001年8月2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如何看待社会发展指标的综合评估》一文中指出，所谓的“英格尔斯指标体系”是中国学者受英格尔斯1983年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一次讲课内容中的片段的启发而加以发挥、杜撰出来的，英格尔斯本人从来没有提出这个指标体系。

<sup>②</sup> 孙立平：《社会现代化》，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24、25页。

<sup>③</sup> 罗荣渠：《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29页。

<sup>④</sup> 罗荣渠：《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46页。

<sup>⑤</sup> 罗荣渠：《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54页。

<sup>⑥</sup> 罗荣渠：《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04页。

语)；“现代化是什么？岂不是为了要使这个国家能站在这个现代世界里？——一切的工作，本来都只是为了建立一个更满人意的国家”<sup>①</sup> (胡适语)；“‘现代化’一词所指的则是从旧到新的一种改变，或对新环境的一种适应”<sup>②</sup>；“一般地说，科学和民主的标识被用来作为现代化的标识”<sup>③</sup> (张君劢语)。上述关于现代化的定义虽然文字表述上各有差异，但它们都有共同的倾向：第一，都认定当时的欧美先进国家为现代化国家；第二，现代化就是当时世界最先进的事物的集合；第三，现代化主要指经济发达、社会发达。很显然，这种定义还谈不上是一种严格的学术研究，只能算是一种简单的社会问题探讨。1949年后，中国国家领导人也曾多次提到现代化，并将之规定为中国的发展目标。“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sup>④</sup>，“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sup>⑤</sup>。这种现代化实际上只是国民经济的现代化，所包含的层面较窄，它只是一种没有明确标准的短期发展目标而已。中国真正将现代化纳入到系统、严密的学术研究当中，是在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其代表人物便是罗荣渠。罗荣渠对现代化作了如下定义：“现代化”是指18世纪后期工业革命以来一直到现在这样一个新时代，这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特定阶段。这个新时代的中心内容是在现代生产力引导下人类社会从农业世界向现代工业世界的大过渡<sup>⑥</sup>。罗荣渠关于现代化是从农业世界向现代工业世界转变的特定发展阶段的定义，比“四个现代化”的定义要广阔得多，在对实践的指导上更富灵活性、战略性。但这个定义也不尽如人意。因为一个事物的定义要能够反映其本质，而“从农业世界向现代工业世界过渡的特定历史阶段”的定义没有使人明白这个阶段与它的未来历史阶段之间的本质区别，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样的标准才能够称得上是“现代工业世界”。

综合上述中外学者们关于“现代化”的定义，可知直至目前国内学术界还没有对“现代化”形成一个完全统一的认识，那么，“现代化”是不是就没有定规，人们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随意地对之加以发挥、解释呢？当然不是。其实，仔细剖析上面提到的各种意见相左的关于“现代化”的定义，可以发现它们之间也有一些共同的看法：第一，现代化的发生是在欧

<sup>①</sup> 罗荣渠：《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07页。

<sup>②</sup> 封祖盛编：《当代新儒家》，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37页。

<sup>③</sup> 封祖盛编：《当代新儒家》，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38页。

<sup>④</sup> 顾龙生：《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505页。

<sup>⑤</sup>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12、413页。

<sup>⑥</sup> 罗荣渠：《现代化的历史定位与对现代世界发展的再认识》，《历史研究》1994年第3期。

洲中世纪之后；第二，现代化吸收了进化论的基本内核，它表现着人类演化的一种进步状态；第三，现代化必须要有雄厚的物质基础；第四，现代化包含的内容是丰富多彩的，绝不限于某一个层面。张静如关于现代化问题的一段论述，对于我们正确理解“现代化”很有帮助，他说：“应该认识到‘现代化’表现为社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方面的先进状态……这里所说的‘现代化’是指特定含义的概念，所指为工业革命以来的整个世界变革的过程。这种变革，不是仅指社会的某一方面，而是社会整体，即从经济、政治、文化到社会生活诸多方面……只有整个社会都是先进的、发达的，才能说是达到‘现代化’”<sup>①</sup>。根据这段论述，综合上述学者关于“现代化”含义的四点共识，再考虑到现代化发展历程的特点，我们对现代化作了如下的定义：现代化是指在文艺复兴运动之后，人类高举科学主义的大旗，最大限度地利用科学，以征服自然力、获取一切资源为人类服务所经历的发展阶段。这个定义表明，现代化的最本质特征是科学主义至上的社会价值准则。在文艺复兴以前，人类社会崇尚的是自然力权威，无论是原始的图腾崇拜，还是后来的酋长崇拜、诸神崇拜、各种宗教教主崇拜，本质上都是对神秘的自然力的崇拜。所以，在西方，万能的“上帝”主宰了人们的命运上千年，而在中国，神秘的“上天”管制人们的活动时间也甚为久远。在这种最高社会价值准则下人类的活动便形成了所谓的传统社会。科学至上社会价值准则的出现使人类跨入现代社会，但科学绝不是万能的，终有一天，人类会采用一种比科学至上更能造福人类的价值准则。到那时，才可以宣布现代化阶段的终结，一种新的人类发展阶段——不妨简称之为“后现代化阶段”，将会到来。但是，在目前及人类近期未来时间内，现代化仍是世界发展的主流。虽然，世界各国有关之士都在讨论“知识经济”，但“知识经济”本质上依然是科学至上主义的反映，它只是相对于工业经济、旅游经济等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而言的。

将科学至上主义确定为“现代化”的本质特征是借鉴了人类已有的文明发展的经验教训后而形成的理性认识。我们清楚地看到，在西方的前“现代”史中，特别是中世纪史中，主导其社会发展的根本价值观基本上是宗教至上、“神灵”至上，这就造成了人们把生存价值的着眼点主要地放在了冥冥不可知的来世上，这样的结果必然大大减少了人们探索自然奥秘的原动力。如果人们对科技创新兴趣的淡化，怎么可能引导社会在科技上有大发展呢？没有发达的自然科技，也就无法奢谈什么“现代化”了。而自“文艺复兴”之后，西方逐渐从宗教至上价值观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很快形成了以人为本位的价值理念，推动着、鼓励着人类追求个人的幸福、现世的安康，从而迅速地激发了西

<sup>①</sup> 张静如：《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54~55页。

方人探索自然和社会发展奥秘的热情，终于造成了西方科技一日千里、蓬蓬勃勃发展的壮观景象。这种壮观景象的不断汇集，终于形成了与此前截然不同的社会形态：“现代化”社会。“现代化”与传统社会发展过程的差异点具体地说来真是有千百万处，但归结到几个要害处来看，则不外乎一点：传统社会里无论是王位本位主义、神权本位主义，还是官本位主义，它们的主旨都在竭力扼杀人的个性、人的本能，倡导人对自然的服从，而使社会多数成员的存在价值服膺于少数人理念的需要；而现代化社会则极力弘扬人的个性，鼓吹人的创造性、积极性，倡导人类对自然力的征服、超越。而人类实现对自然力的征服、超越只能凭借于科技。进化论的出现，甚至于唯物史观的形成，从根本上来说都是奠定在对科学作用的无限信任的基础之上。人类社会发展的关键问题就是人如何处理与自然界的关系。传统社会在关于人与自然界关系的处理上只认识到了有限土地资源的价值，没有认识到更直接、更精粹、更广泛地利用其他自然资源，于是作为最可直接使用、最显而易见的土地便成为传统社会最可宝贵的资源，于是便形成了所谓的游牧文明、农业文明——即传统社会。

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社会之所以能形成比同时期西方发达的科技文明，就是因为此间中国社会盛行着儒家的“民本主义”。虽然传统社会里的中国皇权在生活中享有着表面上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占统治地位的儒家理论从来信奉着一个根本的道理：民为贵。历代王朝也都以是否福祉于百姓及福祉于百姓程度的高低作为衡量其有道与否及有道多寡的根本尺度。这就使中世纪的中国比同时期的西方更关注物质生产，其所需借助科学来从事生产的分量自然要比西方多得多，这样很自然地造就了传统社会里的中国在科技发达程度上比传统社会里的西欧要先进得多。

近代以后，西方的科学至上主义思潮日渐显露、日渐深入人心，而中国却依然停留在把科学视为仅仅为了满足“君民”共存所不得不借助的手段这样的认识水平上。科学在人们的心目中并没有占有很高的地位，甚至被一些人视为“奇技淫巧”而已。整个社会信奉着能“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官本位主义，终使得中国人的科学创新缺乏深刻的精神动力支持，中国“现代化”建设焉能发达昌盛？可以说，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充分地说明，有无科学主义的价值观作为社会的主导思想，是决定一个社会能否走向“现代化”的根本前提。

之所以对现代化作出上述定义，我们是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第一，要使“现代化”成为一个有相对稳定的定规、可以为人把握、具有现实意义的理论，不至于使之变成一个无边无际的过程；第二，使人类认识到科学主义并非万世合理，从而激发我们超前探索人类美好未来进程的战略意识；第三，有助于人们将现代化研究纳入到有确切含义的规范化轨道。

## 二、中国现代化的缓慢启动

14—15世纪，当西方正在慢慢汇聚着一股“文艺复兴”浪潮的时候，中国的士大夫和官僚们却正热衷于光大儒学、醉心于心性修养、整日痴迷于反求诸己、与世隔绝式的苦心冥想；从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西方世界不时刮起阵阵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狂风暴雨，求“自由、平等”的呼声阵阵响彻欧美大地；工场手工业首先在英国勃然兴起，圈地运动以非人道的方式逼迫着英国农民放弃田间劳作，转变成纺织工人，此举却意想不到地揭开了产业革命的序幕，人类开始向现代化变革的新时代迈进！而此时的中国却依然满足于男耕女织却并非浪漫的田园式自然经济状态的生活方式，学人士子苦读圣贤书、奔命科举路，什么工业生产、什么科技创新，几乎没有引起一个中国人的高度重视。只是在鸦片战争的炮声震动下，中国才抖动了几下僵硬庞大的身躯，很不情愿地挪动了沉重的脚步，中国现代化才开始了象征性的历史启动，不幸的是，与之伴随的却是长达百年沉重的中国民族苦难史。

常以“煌煌文明五千年”自居的中国何以在“现代化”文明的创造上没有捷足先登，却是那么姗姗来迟呢？这是多么的令人遗憾呀！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任何历史的遗憾，又都是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共同着力的结果。那么，中国现代化进程启动姗姗来迟的历史必然性和偶然性又是什么呢？

### （一）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悄然停滞

虽然古代的中国向无科学主义的传统，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在于“人事”的处理上，人们没有形成一种对科学技术的奥秘孜孜以求的强烈探索欲望，整个社会更没有形成一种崇尚科学、垂青技术的价值观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落后。然而，自从英国的李约瑟博士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问世后，使西方人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辉煌历史已形成了共识：“中国人还是成功地在希腊人之前做出了许多科学技术上的发现，与掌握了古希腊科学知识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在公元1世纪到13世纪之间达到了一个西方世界无法企及的科学知识水平”<sup>①</sup>。据1975年出版的《世界自然科学大事年表》统计，从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11世纪，中国共有135项重要科学成就、发明或创造问世，占同时期世界总数231项的58.4%；公元11—16世纪，中国这方面的成果仍有38项，占世界总数67项的54%<sup>②</sup>。毫不夸张地说，中国

<sup>①</sup> 李约瑟原著，柯林·罗南改编：《中华科学文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sup>②</sup> 转引自郝侠君等主编：《中西500年比较》，中国工人出版社1996年版，第14页。

古代社会的确堂皇伟丽，其科技成就足可骄人，中华文明实堪雄视宇内。“我中国固具有囊括宇内，震耀全球，抚视万国，凌轹五洲之资格者也。有二千万方里之土地，有四百兆灵明之国民，有五千余年之历史，有二帝三王之政治。且也，地处温带，人性聪明，物产丰饶，江河源富，地球各国所无者，我中国独擅其有”<sup>①</sup>，邹容的这番激情豪迈的陈词，是近代以前中国人对自己的文明优越的发自内心的认同。

但是，中国人这种豪迈的心理在鸦片战争之后，便愈演愈弱，到20世纪初，已蜕变为一种自卑心理了，即使在那些顽固不化的迂腐官僚士子的身上也只剩下蛮不讲理、自欺欺人的虚幻自尊的影子而已。中国古代科技文明的辉煌已成昨日黄花。

邹容的这种自豪感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中国古代所创造的发达的科技文明基础之上。

考古学家们已经证明，早在文字记载史之前，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比同时期其他地区要先进得多。而有文字记载的中国科技史料则更充分地证明，古代中国的科技水平在世界上独占鳌头，尽开风气之先。对于这个观点我们可以从中国古代在自然科学领域重要门类：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医学的具体成就中得到明确印证。

在数学领域，中国早在商代就有了比较完善的十进位记数系统。到春秋战国之时，中国人已发现了勾股定理，又出现了筹算系统，使十进位制更加成熟，为日后珠算的出现打下了理论和实践基础；此时我国已广泛地使用分数概念，已初步了解了负数的用法。先秦时期中国的数学成就的集中性成果便是《周髀算经》。到秦汉时期，我国数学的主要成就集中在《九章算术》之中。该书涉及算术、初等代数、初等几何等很多领域，提出了关于多元一次方程组的解法、用“盈不足术”解析线性方程、不定方程问题的研究、开方术、关于正负数以及某些体积的计算方法等问题。魏晋南北朝时，魏人刘徽注解了《九章算术》，其中计算出了在当时最为精确的圆周率数值，而南朝的祖冲之则准确地将圆周率推算在3.1415926与3.1415927之间，领先西方1 000年。唐代王孝通所著《缉古算经》首先使用了一元三次方程来求解问题。北宋沈括提出了“隙积术”，用以研究一种高阶等差级数求和问题，还总结出了由弦和矢的长度来求弧长的计算公式。同时期的贾宪著有《黄帝九章算法细草》，提出了“增乘开方”法，和“开方作法本源”图，确定了新的开平方、开立方的方法，绘制了指数为正整数的二向式定理系数表。南宋的数学家李冶整理了前人的数学成就，提出了关于一元高次方程的一般方法与解法的“天元

<sup>①</sup> 邹容：《革命军》，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6~27页。